
国家与地方：生态人类学视角下

民族地区的渔业变迁

——以贵州望谟蔗香村为例

任振一¹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在二十一世纪初，随着龙滩水电站的建成蓄水，蔗香村进行了原址搬迁，搬迁后的蔗香村没有舍弃渔业，而是借助新自然环境将其发扬光大，后来随着旅游开发以及环保工作等进程的推进，蔗香村的渔业逐渐走向萎缩。在新自然环境、国家政策和村民行动三种力量作用下，蔗香村渔业历经兴衰。通过对蔗香村渔业的实地调查，可知蔗香村渔业的变迁，其背后是新自然环境影响下国家逻辑与地方逻辑的角逐，在变迁中，达到新自然环境、国家逻辑和地方逻辑这三者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民族地区 新自然环境 国家逻辑 地方逻辑

【中图分类号】Q989；C911 **【文献标识码】**A

渔业，又称水产业，是指利用水域以取得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或其他水生动植物的生产部门。狭义上渔业包括采捕水生动物资源的水产捕捞业和养殖水生动植物的水产养殖业两个部分，文中的渔业主要指狭义渔业，但对捕捞与养殖之外的渔业情况，如鱼餐饮，也会有所涉及。

关于渔业变迁的研究，海洋人类学是一个重要领域，“海洋人类学的前沿动态——评《海洋渔村的“终结”》”，介绍来自两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两个不同学科对两国渔村变迁的研究。在旅游人类学方面，“比较视域下旅游发展对渔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基于旅游村和传统渔村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发展旅游产业和传统渔业的两个村的田野调查和比较研究，考察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对渔农村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在环境人类学方面，“环境人类学视域下的海洋渔业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以粤西硇洲岛渔业生态环境变迁史为例”，借助环境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湛江硇洲岛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题为个案，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剖析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困境的原因。人类学对于渔业变迁的研究表现在分支学科方面——海洋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表现在社会、文化等要素与自然要素的结合方面。虽然人类学对于渔业变迁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但是人类学对渔业变迁的研究重文化轻发展，所开展研究的应用性不强。本文既有文化关注，又有应用倾向，概述渔业变迁过程，揭示变迁背后的国家逻辑与地方逻辑，研究渔业变迁而不局限于渔业变迁，从变迁中得到指导变迁的方法。

1 搬迁后蔗香村渔业的兴衰

作者简介：任振一(1996-)，男，山东潍坊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校级项目：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基金项目(3212020sycxj251)

贵州省望谟县蔗香镇蔗香村，坐落在红水河北岸，南与广西乐业县隔河相望，村落距离双江口(南、北盘江交汇处)约 500m，与蔗香港口相邻。根据镇政府提供的蔗香村 2015 年人口数据，蔗香村全村总人口 1886 人，均为布依族。蔗香村是龙滩水电站库区移民过程中原址搬迁的村落。2006 年，蔗香村原址搬迁，村落向上移动 200 多 m。因为当时新居还没有修建好，所以搬迁后的村民暂时被安排在帐篷里过渡性安置，这时村民们已经开始了新生计方式的探索。

库区搬迁移民后，蔗香村迎来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在渔业的变迁方面，呈现出渔业与旅游业相交织，与环保工作相适应的状态，体现了在当地新的自然环境下国家政策与村民行动之间的角逐。

1.1 捕鱼

村民根据龙滩水电站库区蓄水后的新自然环境，调整捕鱼方式，提高捕鱼的机械化水平，增加渔获量。

2006 年以前，蔗香村尚未搬迁，村民们居住在河谷(现在搬至半山腰)。“当时红水河最宽处大概 100m 左右，洪水期最窄处 30m 不到，由于河道窄，水流湍急，捕鱼的人比较少，那时还有人自己做网，手工编织‘撒网’(一种渔网)捕鱼”，村民龙某说到。

库区开始蓄水后，随着土地和植物等被淹没，许多营养物质进入水中，产生了“水肥”的现象，鱼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此外江面拓宽，江水变深，水流变缓，有利于机械化捕鱼。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从事捕鱼的村民增多，捕鱼的方式也更加机械化，普遍采取“机器船+挂网”的捕鱼方式，而手工织“撒网”的技艺及用手工“撒网”捕鱼的方式也因为不适用于新环境而难觅踪迹。虽然在捕鱼方式方面有法律规定，但为了有更多的渔获，仍然存在电鱼等非法捕鱼方式。电鱼由于其具有较高效率，使得部分村民铤而走险。

相较于捕鱼，网箱养鱼是更多蔗香村村民的选择。因为与捕到的鱼相比，网箱养殖的鱼品相好，产出稳定，且可以不喂食，口感与野生鱼相差不大。

1.2 网箱养鱼

村落搬迁后不久，周边村落就有村民发现了网箱养鱼的技术。网箱养鱼的方式首先由村民根据当地新的自然环境条件来获得和改进，继而经过养鱼大户的推广而形成规模，形成一定养殖规模后，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最后在与环保和旅游政策相抵触的情况下，网箱养鱼遭到禁止。

韦某是移民村(蔗香村邻村)人，2008 年以前主要使用小竹箱(透气性差，水流不畅)来养鱼，渐渐发现竹箱养鱼不利于鱼苗生长，便从 2008 年开始网箱(透气性好，水流通畅)养鱼，随后慢慢扩大规模。2009 年开始，在他的帮助带领下，周边农户已有 13 户采用网箱养鱼。从韦某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网箱养鱼的兴起和传播，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韦某由从事竹箱养鱼到从事网箱养鱼，经历了一个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根据红水河的“流水”条件，水流通畅的网箱比起水流不畅的竹箱，可以为鱼类带来更充足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更加有利于鱼类的生长，鉴于此，韦某改竹箱养鱼为网箱养鱼。此外，正是由于该区域像韦某这样的养鱼能手的出现，网箱养鱼的方式才得以逐渐传播，成为蔗香村及周边村落渔业的重要内容。

蔗香村养鱼户的网箱养鱼，经历了由兴到盛再转衰的过程。蔗香村邻村养鱼大户的养鱼方式在取得成效后迅速传入蔗香村，蔗香村的网箱养鱼随之兴起，并在后来受到镇政府的资金与技术支持。2014 年后，蔗香村及其附近水域成为了旅游景区，因为蔗香村网箱养鱼区域位于双江口滨湖度假区内，所以网箱养鱼被禁止，政府开始拆除网箱。此外，对网箱进行拆除还出于国家环保工作的要求。由于违背了多个政策，网箱养鱼跌落神坛，养鱼盛况忽然而已，不能继续网箱养鱼的村民转而从事其他工作。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环保要求的提高，蔗香村的网箱养鱼开始走向萎缩。

网箱的拆除，使得村民的收益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外出务工。网箱养鱼被禁止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环保工作进一步整改要求：水上餐馆与其他水上设施的拆除。

1.3 鱼餐馆

鱼餐馆是村民凭借红水河鱼、旅游以及航运等优势而建立的，因为网箱养鱼被禁止以及人流量的减少，所以其发展陷入困境。

库区蓄水后，航运更加繁忙，蔗香港口日常人流量增大；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旅游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观光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到水上鱼餐馆或街边鱼餐馆品尝红水河鱼)，节假日游客人数多。这为大量水上鱼餐馆和街边鱼餐馆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过渡性安置期间，蔗香村开始有村民在江边开水上鱼餐馆，鱼餐馆取得良好效益后，又有几家效仿。新居建好之后，也有其他村民在街边的新居开鱼餐馆。在蔗香村的水上设施(不包括网箱)拆除前，有水上鱼餐馆4户。

以红水河鱼为特色的蔗香港口江边的水上鱼餐馆，曾在旅游活动中备受欢迎，如今随着水上设施被拆除，水上鱼餐馆只能搬到街边，不仅餐馆的位置特色性大打折扣，而且失去了港口的生意，在街边经营的状况远不如以前。而开设在街边的鱼餐馆由于网箱养鱼被禁止而失去了优质的鱼类货源，同时由于旅游特色性降低(没有了水上观光和水上鱼餐馆，旅游内容局限于特色性不强的民族文化旅游)，节假日游客减少，其发展情况也不佳。

鱼餐馆生意远不如以前，村子的经济活力也在降低。收益降低的村民们，想方设法另谋生路，以补偿村庄经济活力降低所带来的损失。

1.4 旅游

蔗香村旅游业是在“十二五”(2010-2015)期间开始迅速发展的，“十二五”期间，蔗香镇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大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发展特色农业、物流业、旅游业。

一方面旅游业正逐渐取代渔业(如前文所述)。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同样也在利用蔗香村的渔业资源，不过这种利用越来越难以惠及全体村民。以野钓大赛为例，野钓大赛开始于2015年，此后每年举办一届。一开始，野钓大赛的受益者主要是开店的村民，而对于从事捕鱼的村民是不利的，因为在比赛期间，禁止捕鱼；而现在，由于水上设施被拆除，导致该地旅游吸引力降低，游客数量减少，进而使得野钓大赛给全体村民带来的效益越来越低。

此外蔗香村的另一个旅游热点是布依族的“三月三”，蔗香村作为“三月三”的分会场之一，利用当地有渔业资源的事实，在“三月三”活动中展演了“传统捕鱼”(在竹筏上用“撒网”捕鱼)等内容。蔗香村依靠当地特色性不强的布依族文化，大搞民族文化旅游，虽然在首届活动中人流量较大，但是后续几次活动因失去了新鲜感以及没有其他特色(如渔业)做支撑，所以游客数量不断减少。“三月三”作为政府层面的行为，仅仅利用了当地的渔业符号，并未与渔业结合，很难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通过“野钓大赛”和“三月三”这两个蔗香村旅游品牌，我们不难发现，失去了特色养殖鱼，没有了特色的水上餐馆，着力依靠当地特色性不强的布依族文化等元素开展旅游，使得旅游的特色性迅速弱化。因而，旅游业也因为渔业的萎缩而逐渐式微。

2 新自然环境影响下的国家逻辑与地方逻辑

龙滩水电站的修建引起了蔗香村自然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新自然环境背后蕴含了蔗香村渔业变迁的深层逻辑，它决定了相

关国家政策和村民行动，决定了蔗香村渔业的未来。

发展旅游业，开展环保工作，这些都是国家政策的体现，背后蕴含了国家逻辑。捕鱼，搞网箱养殖，开水上餐馆等，这些都是蔗香村村民的选择，背后蕴含了地方逻辑。在新自然环境的影响之下，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逻辑与以当地村民为代表的地方逻辑在其中角逐。在刚刚搬迁后，村民们积极探索生计以发挥地方逻辑时，当地的渔业开始兴起，但发展相对缓慢；在国家逻辑与地方逻辑均得以发挥时，渔业借助旅游业带来的人流量得以兴盛，旅游业也获得渔业的支持，但由于忽略了环保工作，这种发展造成了红水河的污染；最终国家逻辑战胜地方逻辑时，发展旅游业和加大环保力度并未给当地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反而使得渔业萎缩，村民收入下降，人口外流。之所以出现这三种情况，是因为两种逻辑和当地新自然环境这三者之间没有达到平衡。

蔗香村的自然环境改变后，呈现出的是村民们的行动和国家政策的交织。我们要做的是将国家发展与地方再造的逻辑相统一，重视当地的自然环境，从当地的实际出发结合国家的政策看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书明，兰晓婷.海洋人类学的前沿动态——评《海洋渔村的“终结”》[J].社会学评论，2013，1(5):90-96.

[2]胡卫伟.比较视域下旅游发展对渔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基于旅游村和传统渔村的田野调查[J].旅游研究，2016，8(3):67-72.

[3]罗余方.环境人类学视域下的海洋渔业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以粤西硇洲岛渔业生态环境变迁史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7，28(3):73-77.